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节 绪 言

中国正当满清嘉庆道光两朝国势开始下降的时候，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经变成走遍世界寻求殖民地的头等侵略国了。英国在十七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叶，开始用机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发展得更快。以棉织业的用棉量及生铁的产量为例：一七七一年至一七七五年，英国加工的棉花仅五百万磅，一八四一年便达到五亿二千八百万磅；一八〇〇年生铁产量为十九万三千吨，一八四〇年，提高到一百四十万吨。

随着工业的发展，英国涌现了许多新兴工业大城。一八〇一年伦敦人口八十四万六千人。但伦敦以外，上五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九个，其中超过十万人的只有曼彻斯特和都柏林。到一八四〇年伦敦人口达到二百五十万，其他城市也都在大量扩充。这些工业城市具有大规模的工厂，制造着各种工业品，特别是纺织业著名的曼彻斯特，烟囱林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纺织中心。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铁路开始迅速建筑起来，轮船也开始在海洋中航行。由于英国工业的飞跃发展，提高了商品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输出的要求；又由于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英国得以

广辟新市场和新殖民地。在印度，英国侵略势力继续向广大腹地推进，获得剥削殖民地的无限利益。这个贪婪强暴而又在印度积有经验的英国海盗，对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中国，抱着极大野心，一刻也不肯放松侵略的机会，是势所必然的。

法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推翻了封建统治以后，法国工业生产，在英国的影响下，尤其在一八二五年英国取消机器输出的禁令以后，工业更进一步的发展起来。一七八九年法国煤的产量为二十五万吨，一八三〇年达到一百八十万吨；一七八八年毛织品出口总值为二千四百万法郎，一八三八年增至八千万法郎。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〇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主要的还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

一八四〇年的美国，工业不但不能与英国相比较，而且还远远落在法国的后面。当时它是二十六个州组成的国家，人口一千七百万，百分之九十是乡村居民。南部诸州盛行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仅仅在东北部诸州有些发展。它能够输出和中国交换的货物，只是一些从印第安人收购来的皮毛。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很低微的。

英法美三国间存在着矛盾。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与争夺欧洲霸权，处在敌对的地位。美国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挣脱英国的控制，美国必须经常应付来自英国的威胁。这三个国家在对华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英国是商品输出的国家，必须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用战争手段来取得这个理想的市场。法国的对华行动多追随于英国之后，它利用天主教作侵略工具，向中国扩张它的势力。但是，要输出宗教到中国来，没有工业品特别是鸦片那样受欢迎，而法国能输出的工业品却不多。美国除皮毛外，它自己很少可以与中国交换丝茶的商品，主要靠贩卖欧洲工业品及土耳其的鸦片。法美两国都不愿英国在中国取得特权，因而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对自己显得不利。英国为了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当它决心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时，公开声明不管英国从中国取得多少新的商业特权，它无意一国独吞，愿与其他国家共同享受。

英国用允许分赃的方法换取法美的赞助，但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时，本身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兵力和交通运输就是显著的两大困难。第一、英国兵力并不雄厚，不可能抽调大量兵力来中国。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以前，英国共有可以作战的陆军十三万五千人。当时分布的情况是：英本国六万五千人，主要是镇压爱尔兰人的革命运动；印度三万人，其他殖民地四万人。这是一八四七年略有增加以后的数字，鸦片战争时，还不到此数。因此它不可能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华作战。第二、中英间距离很远，运输线很长，交通困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东方号以九十七天的时间，完成自香港直航伦敦的海程，引起英国的极大注意。鸦片战争时，中英间单程航行，一般需要四五个月的工夫，这加重了英国作战的困难。

被英国看作侵略对象的中国，单凭布匹是难以侵入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生产情况，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广大农民遭受地主残酷的剥削，过着勤劳穷苦的生活，只能满足于结实而廉价的土布，不需要外国机器布。社会上层人士，四季服装有一定制度，材料全用丝织品，中国的养蚕业和丝织工业在当时举世无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给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上谕），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满清政府传统的闭关政策，也养成了满清政府的顽固昏聩思想。这种政策和思想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停滞性。英国布匹与毛织品显然不能在中国市场取得必需品的地位和广泛推销的机会。习惯于海盗行为的英国政府，为要打破中国的大门，可耻地进行臭秽的鸦片贸易，再加上凶横无理的武装攻击；而看守中国大门的恰恰是腐烂了的满清王朝。它是最坏的看门者，它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文化紧闭大门，对鸦片却偷偷开门让它流进来。

下列简表显示战前中英贸易的概况（单位千元）：

年 份	中国对英输出额	英国对华输入额
一八一八年（嘉庆二三年）	一四、一四四	一六、〇〇四
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	一四、四〇一	一五、九三二

一八三三年（道光一三年）一七、八一四 二二、三〇四

上表英国对华输入品中包含鸦片，中国对英输出品中都是正当商品。在正当贸易方面，中国是出超国，但鸦片输入，却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鸦片输入历年激增如下表（单位千元）：

一八一八年 嘉庆二三年）	四、七四五
一八二二年 道光二年）	八、八二二
一八二五年 道光五年）	七、六〇八
一八三一年（道光一一年）	一三、七四四
一八三三年 道光一三年）	一二、八七五

看上表鸦片大量输入，其中虽含有美国、葡萄牙两国的鸦片，但为数较少，极大部分是英国的鸦片。鸦片在中英贸易中成为决定性的商品。英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鸦片输入额依国力而逐年增大，反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继续腐化堕落，无法阻止大量白银因鸦片输入而逐年流出，最后必须一战，战败者自然是满清。

第二节 可耻的鸦片输入者

第一期输入情况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六〇〇年成立）占领鸦片产地孟加拉。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八年）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开始对中国经营鸦片贸易。要顾全公司的“名誉”，表面上禁止公司船贩运鸦片，但给予私人商船的执照中，却列有一项条文，注明这些商船除运输东印度公司自己生产的鸦片以外，不得运输任何鸦片，违则罚款。从此输入量逐年增大，一七八〇年（乾隆四五年）至一八一六年（嘉庆二一年）公布的数字为每年输入约四千至五千箱，据东印度公司航务长的记录，说“一七八六年中至少已有二千箱鸦片运入中国，较六年前每年所输入者，已超过五六百箱”，足见实际输入比公司发表的数字大得多。本期内满清政府感觉到鸦片的压力，于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一八一四年（十九年）、一八一五年（二〇年）三次严令禁止，但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植及其向中国的私卖，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决不放松对鸦片贸易的鼓励。

第二期输入情况 一八一六年，东印度公司允许鸦片自由贸易，这给了英国私贩们的营业以新的强大的推动，输入更旺，至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竟达二一、七八五箱的巨额。本期内英国工商业愈益发展，不仅需要中国大量茶叶供给本国及欧陆各国，一八二〇年（嘉庆二十五年）起，又需要中国大量生丝供给本国丝织工业。中英贸易的支付方法是英国在印度经营鸦片，然后再来用鸦片转向中国换取丝茶和白银。中国感到鸦片威胁的严重，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满清政府执行禁烟法令，要求搜船并令其立“不售鸦片”字据。东印度公司通令公司船、私人商船坚决拒绝，认为“为保持英国之尊严及公司之利益，凡悬挂英国国旗之船，必须拒绝搜查”，又认为“若公司应允签写此种誓书（字据），将来对于欧洲与中国之贸易，恐发生恶果”。如果私人商船出立字据，“航务委员会便取消彼等之贸易特许权”。它派兵船一艘到广州示威，把怯懦的满清政府吓倒了。此后清政府于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二九年、三二年、三四年订立各种法令，企图禁运禁吸，但除了二一年鸦片商船自黄埔、澳门移至伶仃洋，贸易更觉便利以外，并不发生禁阻的效果。

第三期输入情况 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以来，英国工业空前发展。一八三二年，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不久，东印度公司由垄断贸易的商务机关改组为政府的行政机关，因此对华贸易就变成了英国私人企业所完全能够执行的事务。这种私人企业的对华自由贸易当时发展得非常迅速，不管中国政府如何抵抗，它们在一八三七年将价值二千五百万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运入中国，一八三八年，运入四万零二百箱。中国发生银源枯竭的现象，感到危险。可是英国政府强迫一部分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用垫款办法来引诱更大一部分农民也去种植，用严格的垄断办法操纵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在政府监督下，由国家官吏拍卖给商人，偷运到中国。每箱鸦片上英国政府所花的费用，约二百五十印洋，而在加尔各答拍卖时，却按照每箱一千二百一十印洋至一千六百印洋的价格发售。印度的英国政府的十分之一的收入都是由于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得来

的，它不惜发动武力来阻止中国的自救行动，资产阶级所谓“文明”、“自由”的实质就是“强权即公理”。

第三节 腐烂的“天朝”

鸦片输入与满清腐烂统治是互为表里的。清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来推进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满清明拒暗受，贯通双方的是贿赂。

鸦片贸易从乾隆后半期才渐渐增多，那时候正是骇人的受贿者和珅做大学士，他开两座洋货库，出售大呢、羽缎、哔叽等英国货，很可能私卖鸦片。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法律规定洋货店有出售鸦片权，当是和珅以来的旧例。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鸦片不仅和地方官吏（主要是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勾结，而且和朝中大官也直接联系着，更不待说政以贿成的间接联系了。任何禁令不能阻止鸦片贸易的增大，中国方面的主要原因在此。

事实上满清皇帝也是鸦片贸易的受贿者，他禁止外商在其他海口通商（康熙时有江浙闽粤四海关），保证粤海关独占利藪，海关监督又必用内务府旗人，替他搜括金银玩好。监督于正税外，勒索贿赂，称为“规费”，雍正、乾隆以来，皇帝经常以清查积弊为名，“将规费改正归公。行之既久，陋规渐又加增，无所底止，华夷各商，咸受其累（道光二三年耆英奏）皇帝勒索监督 监督勒索洋行 洋行勒索外商，费上加费，有增无减。耆英所谓“从来清厘积弊，另定新章（陋规归公），大抵如此，不独关税一事为然”，确说破了满清统治者在这方面剥削的秘密。若干年一次的海关陋规归公以外，还有每年照例贿赂，定出办贡、备贡、人参变价三种名目。办贡是随时献纳新奇物品；备贡（年贡）每年三次，是无代价的献纳呢、羽、钟表等英国货；参价是朝廷发给海关若干斤人参（吉林贡品），按高价变钱献纳。海关从鸦片得肥，皇帝从海关分肥，因之朝廷可以严禁鸦片，但不能严禁官吏受贿。英政府质问清朝：“岂得开一眼而鉴远人（英商）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琦善转呈《英外部

大臣致满清宰相书》)。这正是禁烟失败的重要原因，满清皇帝是一只眼看鸦片的毒害，一只眼又看鸦片的利益的。这就是说，不管嘉庆帝如何积极严禁，却丝毫不能阻止鸦片的输入，禁令只供官吏利用，向鸦片商勒索更多的贿赂。从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来，历次禁烟都证明这一事实。试看开始积极禁烟的嘉庆帝得些什么效果？

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嘉庆帝颁布禁烟法令。一七九八年东印度公司航务长向印度长官报告说：“一般人均相信，海关监督因暗中鼓励此种违法贸易，借以发财，彼决不能积极设法禁止。”一八〇二年（嘉庆七年）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报告：“中国政府虽然一再颁布禁烟法令，而鸦片之销路确已大增，毫无疑问。”

一八〇九年（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兼代理关务百龄发令禁运。一八一一年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报告：“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嘉庆帝令刑部拟定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分别治罪条例，上谕斥责官吏说：“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一八一五年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记载：“当时因官吏阻碍贩烟，阿立加先生遂决定每箱抽税四十元，以分与中国官吏。”

嘉庆帝禁烟的结果就是这样。道光帝继续严禁，结果还是一样。

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十二月）上谕严禁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说：“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两广总督）、达三（粤海关监督）认真查拿。”阮元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这八个字的后面，自然是大批贿赂。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总督李鸿宾设巡船。“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圣武记》）。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上谕严禁贩运吸食及私种烟苗。次年，东印度公司航务记录说：“最近伶仃洋内所运入之货，特别加多。中国政府虽欲消灭此种贸易，兹无论其有无诚意，而并未成功。”“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

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片烟遂至四五万箱矣。”（《圣武记》）

广东官吏从鸦片贸易获大利，内地官吏当然不甘落后，欢迎鸦片广泛流行，从中取利。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称：“鸦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风不息而愈炽者，非立法之不严，实稽察之不力。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运至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各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是兴贩者确有来踪，不难稽查；而开馆者则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属，认真查缉，何至不可遏绝。”这说明官吏是鸦片贸易的保护者，他们的利益早和鸦片混成一片。内地大量种烟，也由于官吏的默认。

天津是北方的鸦片大市场，贵族官僚集中地的北京盛行吸烟可以想见。耶稣教传教士与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德国人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又译作郭甲利）熟悉中国官场情形。一八三六年，英政府派领事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驻粤，义律约郭士立商议推广鸦片的方法，郭士立议论滔滔，大意说：“清廷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多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武培干著《鸦片战争史》：《义律小传》），义律大喜，托郭士立包办朝廷方面苞苴之事。

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说：“英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停驻黄埔的英国商船偷运来华的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底柱石”（《鸦片贸易》第二篇）。其实满清统治者的肺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被贿赂薰染得秽浊不堪，他们接受鸦片贿赂，只是看作普通受贿一样。但在英国海盗说来，他们既被收买，就不该再来阻挠鸦片。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鸦片的，从贿赂事件中，看透了行贿者和

受贿者的极端无耻。向来依靠封建伦常来欺骗人民的满清统治者，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揭发得丑恶毕露。伦常的柱石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第四节 烟毒泛滥于中国

杀人的英国侵略者与腐败的中国统治者合作，尽量推广鸦片贸易，到道光时代（一八二一——五〇年），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骇人的破坏现象。

从鸦片销场看，鸦片已流行全国。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上谕：“鸦片流行内地，皆由番舶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一八三一年（十一年）上谕：“鸦片局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鸦片“由海路运至天津，有数栈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带贩烟土回籍”（《宣宗圣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沾染恶习日深，几成积重难返之势”（黄爵滋、耆英等奏）。这些说明英国鸦片在中国境内已组成了经济侵略的毒网。

从鸦片吸食者看，鸦片渐渐取得对中国统治阶级及统治阶级的依附者精神上的统治权。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奏：“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作坊、商店主人）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蒋湘南与黄爵滋《论禁烟书》：“今之食鸦片者，京官不过十之一二，外官不过十之二三，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之五六，至长随吏胥不可以计数。”蒋湘南的说法，只是约略的估计，所谓京官不过一二，经满清皇帝指出有亲王、辅国公等高级贵族，有宫中侍卫、内廷太监等皇帝亲近人，有“世职官员相率玩法”，决非一二少数。尤其使朝廷恐慌的是兵丁吸食鸦片；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道光九年上谕）镇压人民的力量削弱了。自从“鸦片吸食者不可胜数”，以北京为中心，全国遍布着满洲贵族、旗丁、太监、官吏、地主、绅士、士人、幕友、商贾、优伶、隶役、绿营兵、僧尼、道士、娼妓一大群鸦片瘾者，据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估计，吸洋烟人数，约二百万以上，几乎腐蚀了大部分的统治人员及其依附人。不仅“拿办烟案之人即吸

烟售烟之人，互相庇护，狼狈为奸，绝无被查拿之时”（《宣宗圣训》），而且吸食者的生活，掌握在英国鸦片商人手中，他们惟恐鸦片不能源源接济，瘾发难过，自动帮助烟商破坏禁烟法令的实施，把禁烟派看成死敌，有意或无意作了英国侵略者的忠实内应。

从财政经济方面看，中国每年出口丝茶等土产，不够抵偿鸦片价，还要补足白银千万两以上，人民“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夏燮：《中西纪事》）。就是说，人民整年的劳苦生产，替剥削者偿付鸦片价还不够，这样，财政上发生银荒，经济上生产力大遭破坏。例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阊阖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旧商货一半被鸦片夺去，情势严重可以想见。一部分统治阶级感到银荒的危险，力主禁烟，一八三八年黄爵滋奏摺，主要从这一点着想。他说：“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黄爵滋所举银数未必确实，但金银大量外溢，确使满清政府痛感：“若再至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国家开支）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自然，满清政府总是向人民，主要是向农民敲剥的，这就是旧捐税已经繁重得难以负担，旧捐税外又加上新捐税。农民无力负担重税，陆续破产流亡，有的在官吏保护下种植鸦片，放弃正当生产，如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山西等省，种烟田亩继续增加，土烟较洋烟价廉，因之烟毒扩大到社会下层去。林则徐又说：“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同上片）。这里鸦片价是指

洋烟，贫民生活穷苦，受购买力的限制，不能吸食洋烟。自土烟盛行，价廉易得，烟毒侵入贫民层，生产力的萎缩和破坏更不堪设想。

甚至于当时英国人马马丁（R. M. Martin）都说出了这样的话：“鸦片贩卖者腐化了、降低了和毁坏了不幸福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们的身体。鸦片贩卖者时时刻刻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就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幅图画！

第五节 统治阶级对鸦片的态度 —— 妥协、抵抗、投降三大派

白银外溢，到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以后，形势实在严重不堪了。满清政府必须处置当前的紧急问题，一派主张弛禁，对鸦片妥协；一派主张严禁，彻底消灭烟毒；又一派人无所表示，实际是主张维持现状，这一派人最后取得胜利。

妥协派——许乃济为首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许乃济奏请弛禁，理由是：闭关不可，徒法不行，洋银有出无入，食鸦片者几遍天下，事实证明禁烟失败了。他主张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民间贩卖吸食，一律勿论，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内地种烟，听民自便，土烟大量生产，英商无利可图，洋烟不禁自绝。这一派的主张纯从挽救漏银的观点出发，以为首先是“税额轻于行贿，偷越之弊，不戢自消”；其次是“以货抵货，有赢无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又其次是“以中国之鸦片抵夷人之鸦片，夷人为利而来 必至折本而去 久之自不复贩”（蒋湘南：《论禁烟书》）。这一派主张如果实行，英印国库可能遭受暂时的损失，但决不能“不禁自绝”，因为洋烟性味酷烈，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成本不大，可以减价竞争，弛禁的结果，势必洋烟土烟同时盛行，鸦片战后情况就是证明。例如，浙江台州出产土烟，“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烟禁大开，鬼

世将成”(道光二二年浙江巡抚刘韵珂《致耆英等书》)，妥协派公开宣布禁官不禁民，准备牺牲人民的生命，全国出现无数黄岩县，他们是不会伤心的。这种露骨的残忍主张，当然被抵抗派严厉斥责，道光帝在抵抗派影响下，革许乃济官职，“以示惩戒”。（十八年上谕）

抵抗派——林则徐为首 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官民吸烟，来抵抗鸦片的输入。办法是限期一年戒绝，过期犯禁，常人处死刑，官吏加等治罪。道光帝令各省督抚大员商议，反对派琦善、伊里布等二十人，其中满员十三人；赞成派林则徐等八人，其中汉员六人。二十八人中反对派占多数，满员又占反对派中多数，这说明禁烟派势力是薄弱的。但道光帝看到林则徐奏文称：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他感到威胁，遂决定严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办鸦片。

投降派——穆彰阿为首 这一派人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是满洲贵族，道光帝最信任的首席大学士穆彰阿暗中主持，为本派首领。他们反对弛禁，因为他们不单依赖于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与英印政府利益一致。他们又反对认真严禁，以免丧失大宗收入。他们以“有伤政体”来反对妥协派的合法输入，以“圣朝宽大”来反对抵抗派的严刑禁止；形式上表示宽严得中，实际是外国鸦片商的代理人。当道光帝倾向于抵抗派的时候，他们暗中破坏烟禁；等到英国侵略者占领定海，道光帝动摇时，他们公开打击林则徐，割地、赔款、开放海口、鸦片无限制输入，迎合英国当时最大限度的需要。这一派人在统治阶级中占领导地位，本身利害与外国侵略者相符合。伴着外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卖国勾当也逐步发达：从穆彰阿开始，继承人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以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卖国贼蒋介石，百年来一脉相传，逼使中国一层一层地陷入殖民地化的地狱里。

第六节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明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他在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这一小诗社中人，黄爵滋发动禁烟运动，龚、魏发动维新思潮，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首领。他后来探询外情及意图制造新式船炮，思想上是早有某些基础的。

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上，首先实行黄氏主张，捐廉配制大量断瘾丸，强迫吸食者戒绝。一面大举搜查，缴获烟枪五千五百余杆，土膏一万二千余两，两湖禁烟大见成效，增强他的自信心，奏称：“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摺》）。道光帝得奏，以为“所办甚属认真”，十一月（十二月）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查办鸦片事件。临行时，龚自珍写一篇《送林公序》，建议坚决禁绝鸦片烟，毋为粤省官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所动。林则徐回信说：“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他又谢绝龚自珍同往广东的要求，说：“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林则徐预见穆彰阿必将伺机破坏，道光帝必将动摇中变，只好“如履如临，曷胜已已”地前去一试，他知道前途是不敢乐观的。不过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以来口头上喧哗的禁烟法令，却因林则徐的一试而暂时变成实际行动了。

（一）严厉的禁烟

（一八三九年二月至十月——道光十九年正月至九月）

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在往广州途中，原来赞成弛禁反对严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放弃旧主张，写信给林则徐立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愿“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从此邓廷桢成为第二有力的禁烟派首领。中国官吏惯用“虎头蛇尾”的方法讹取贿赂，起初禁令森严，对被讹者示威，等到贪欲满足，禁令

即成具文，义律懂得这一惯例，住澳门观望形势。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官吏，有决心禁绝鸦片，在路上密札广东官吏按清单严拿“包买之窑口，说合之孖毡（经纪），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密拿汉奸札》）。三月十日（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广州，英国老鸦片商查海见势不佳，逃离中国境。伶仃洋面之趸船二十二艘（每艘存鸦片一千箱上下），企图开船暂避，被林则徐派水师制止。

三月十八日（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传集怡和行伍绍荣等洋商，宣布谕帖，令转谕各洋商公司人等报明存烟实数，谕帖中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满清官吏表示如此坚决的意志，多少年来鸦片商不曾见过，义律无法推诿，来到广州，但仍取观望态度，暗中反抗缴烟，指使老鸦片商颠地（Lancelot Dent）夜间逃遁。林则徐查明截回逃人，按照“违抗封舱”旧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严密围守洋馆，撤退沙文（洋馆中仆役通称沙文 servant），断绝趸船与洋馆往来交通。义律大窘，陆续交出全部鸦片二万二百余箱，重约三百余万磅，核银约八百万两或银元一千二百万元。林、邓、怡良（广东巡抚）三人会奏：“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夷人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摺》）。

英政府接到义律的报告，就决计向中国派遣侵略军。一眼看鸦片祸害的道光帝，以为“外夷”畏惧“天朝”，因而发生虚骄心。但他另一眼看的是鸦片利益，禁烟成功对他和大部分的统治人员是有损害的，因而发生鄙吝心。至于缴烟将发生何种后果，他在精神上丝毫不曾作准备。他的虚骄心，表现在林则徐奏摺上朱批“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所办可嘉之至”一类的话上；他的鄙吝心，表现在十余万斤茶叶钱让林、邓等私人捐办，不问钱从何来，只要不动用公款，乐得“照所议办理”。义律、郭士立、穆彰阿这些老奸看透他的弱点。侵略者从外面用兵船大炮来对付虚骄心，投降派从内部用“劳师糜饷”来对付鄙吝心。事变演进全出他意想之外。从四月起，他在投降派阴谋影响下，开始表示动摇，此后他左右摇

摆，虚骄心招致战祸，鄙吝心造成惨败。

四月（三月）林则徐、邓廷桢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督率文武官员收缴鸦片，驱逐外国鸦片商，查拿吸烟贩烟人，深得广东人民拥护，进行极顺利。各省禁烟运动受广东影响，相继发展起来，鸦片贸易确是可危了。道光帝突然下一道严谕，斥责禁烟的官员，说“其弊不可胜言”禁止收缴“民间烟土烟具”；嗣后各省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土烟具入奏”，他还讥笑那些自首戒烟的人说：“何必呈缴烟具以自表其改悔？”这一道实际停止烟禁的上谕，主要是打击禁烟最严的林则徐。林、邓见前途危险，恳求道光帝坚持禁烟政策，说：“无知蚩氓，相率传说，转幸明谕之颁，冀遂深藏之术。若因此顿更大局，非独前功可惜，更虞挽救无方。且风闻外夷于呈缴之后，知内地民人烟可不缴，不无反唇相稽者，于国体尤有关系。臣仰蒙委任，专办此事，下怀实深焦急”（《沥陈民间烟土烟具仍宜收缴片》）。道光帝不听。这是投降派对抵抗派第一次打击，取得胜利。

五、六两月（四、五两月），林则徐收缴全部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虎门滩上烧毁（六月三日开始，至二十五日烧毕）。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六月三日”，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一日。投降派方面也在六月底（五月中）拟出一个《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由道光帝公布。章程所定刑罚极严，条文极密，似乎政府决心禁烟，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这等于保证官吏有权贪污，鸦片瘾者有权吸食。抵抗派山西巡抚杨国桢奏称：“在官人役及官亲幕友长随人等，托足公门，势必互相容隐，巧为弥缝，请变动新例，准军民人等告发。”道光帝下谕批驳，言语支吾，说不出“不许讦告”的理由，只能依恃君权硬说：“所请军民告发之处，格碍难行，着毋庸议”（《东华录》），这是投降派对抵抗派第二次打击，取得胜利。

鸦片贸易是英印政府的重要财源，是满清官吏的巨大弊窦，又

与数百万贩烟吸烟人的生活有关，禁绝鸦片决不像林则徐所想所做的那样简易，这是很显然的。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在与外人实际接触中，林则徐逐渐改正旧思想，开始从无知进到探求新知，从严禁鸦片进到奖励通商，他的思想是在向进步方面变化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地主开始有转化的倾向，林则徐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保守分子的特色，就是他愿意了解外国国情。

《圣武记》说：“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林则徐认为“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因此“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他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他的友人魏源根据《四洲志》编《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四年初版，记事更详备。日本明治维新，受《海国图志》影响甚大。其余如汪文泰著《红毛英吉利考略》，道光二十一年出版；杨炳南著《海录》，道光二十二年出版，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道光二十八年出版；都比《四洲志》后出。）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有这些逐渐增加的新知识，对外态度，显起变化。夏燮《中西纪事》记林则徐自销毁英国贩进的鸦片后，曾两次照会英国女王，说他“始则摄之以威，继则怀之以德”。他的第一次照会的内容如何，因《林则徐政书》不载，现已无从知道（可能即梁廷枏《夷氛闻记》及李圭《鸦片事略》所载的那个照会），但他的第二次照会（一八四〇年一月——十九年十二月发），则说：“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

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把英政府与鸦片商区别开来，留出交涉余地，和完全盲目办外交者不同。西人《澳门月报》说“林则徐留心外国事务，观其知会英王第二封书，足见其学识长进之效验”，这是公正的批评。

林则徐对外国鸦片商坚持强硬态度，令进口各船出具“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甘结。他的第一理由是：“贸易一事，该国（英）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英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祈祷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情形摺》）。他的第二理由是：“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具结）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他看出英美间矛盾，又看出华商与外商间矛盾，不怕英国也不怕各国商人停市挟制。尤其是商船往南洋一带贩茶，获利倍蓰（《圣武记》）使他更有恃无恐。同时各国商船，主要是美国商船，具结进口，带来洋钱一二百万元，呈“近年颇为罕见”的新现象。林则徐获得这些成效，愈益坚持不具结不准进口的主张。投降派奏请道光帝免鸦片商具结，说：“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具，徒开含混之路。”这是代表义律及贪污官吏的意见。因为当时义律已经承认“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没官”，对“人即正法”字据，则坚决拒绝。在义律清楚懂得“缴烟系一时之事，具结乃长远之事”。林则徐调走后，“货尽没官”要用大贿赂使成文，已是对禁烟退让一步；“人即正法”，要用更大贿赂，实不甘再让。在贪污官吏获得“货尽没官”甘结，足够借端勒索，饱填欲壑，不再希望“人即正法”的权利，认为禁烟应该就此结束。林则徐也懂得这些情形，却以为“夷情最重信字”（《会奏谕办英夷情形摺》），“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复奏